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6.09.039

大学英语课程“人文性”与“工具性”之再认识

凌建娥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先后提出大学英语课程兼有“工具性”与“人文性”,俨然两者旗鼓相当。究其实,前者着眼于语言的功能,后者才指示语言的性质,彰显大学英语教育的价值理性。充分认识两者的内涵及其关系有助广大从业者清醒面对全球化时代不断加剧的工具理性,在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实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大学英语;课程性质;语言性质;人文教育;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G6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6)09-0123-05

《大学英语教学要求》(2007,以下简称为《要求》)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征求意见稿,2014,以下简称为《指南》)先后提出大学英语课程兼具“人文性”与“工具性”,但避而不谈两者的内涵及其关系。有关学术争议多围绕孰轻孰重而展开,将问题演变为大学英语教学究竟应该加强“人文性”还是“工具性”,还是两者并重之争。有人取样分析发现,这些争议中“人文说”占多数,“工具说”次之,极少数主张“并重说”,而且如此分歧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源自彼此误解和以偏概全^[1]。为此,有必要再认识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内涵及其关系,让广大从业者清醒认识到自身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和目的,在《指南》启动的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下看准自身努力的方向,全力应对全球化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 “人文性”与“工具性”的提出

《要求》与《指南》虽然都指出大学英语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但提出的语境不尽相同。前者在“大学英语教学的性质与目标”板块对此并无涉及,只在“课程设置”板块中提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要求教师在课程设计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2]。从这里的描述来看,“工具性”落实于“语言基础”,而“人文性”落实于“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两者兼顾的课程统一于“素质教育”。这一表述无疑直接导致将“工具性”等同于听、说、读、写、译技能,将“人文性”等同于开设人文类课程的狭隘认识。

《要求》出台7年以后,教育部启动新一轮大学英语改革,《指南》的征求意见稿进入公众视线。它增设“课程定位与性质”板块,明确指出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并将“工具性”的内涵落实于语言技能和专业用途英语的培养,将“人文性”的部分内涵落实于跨文化教育^[3]。这一表述固然有效扩充了“工具性”的内涵,但对于充分认识“人文性”的内涵并无裨益。

此后,究竟该如何认识大学英语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成为学界热议话题。张绍杰(2010)

收稿日期:20160516

基金项目: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第七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

作者简介:凌建娥(1970-),女,湖南株洲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语教育、英美文学研究。

认为它们首先是语言性质^[4]。的确,《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也都提出各自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的释义,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人与人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转引自[5]}。据此看来,语言的“工具性”可谓一目了然,但“人文性”的内涵却显得扑朔迷离。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可能仅指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因为那样将架空了“人际交往”与“认知事物”的内容,让它们无处安身。此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于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认识呼之欲出。在他看来,语言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没有它,人将不能“在寂静中进入这个世界,心灵封闭,错过与宇宙一切伟大、健全事物相遇的机会”^[6]。在此维度下认识语言的“人文性”,看到人在“人际交往”与“认知事物”上的主体地位,未尝不是一种出路。

由此看来,的确是语言性质直接导致语言类课程的性质,而这一性质又直接决定了语言教学的方向与目标。张绍杰提出应淡化“工具性理念”指导下的教学——以语言的“工具性”为侧重点和导向的教学,而强化“人文性理念”指导下的教学——以语言的“人文性”为侧重点和导向的教学^[4]。随着上海市以“学术英语”为导向的《上海市大学英语教学参考框架(试行)》(2013)出台,上述观点可谓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引发的热议持续至今。业内人士高度关注“学术英语”这一凸显“工具性”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是否该成为今后大学英语改革的方向。文秋芳(2014)清醒指出,大学通用英语课程与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两者均具有不同的“工具性目标”与“人文性目标”,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才是大学英语教学的挑战^[7]。为此,广大从业者需深入挖掘两者内涵及其对教学的指导意义。

2 “人文性”的内涵及其对大学英语教育价值理性的规约

如前所述,《指南》是在大学人文教育框架下提出大学英语课程性质的,称“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教育人文教育的一部分”,而此前的《要求》只提“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指南》将大学英语课程纳入高校人文教育框架,不仅明确了其学科属性,还喻示它应该是人文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教学。《指南》称,大学英语课程“人文性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3]。这一描述与学界对于人文教育的认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张楚廷(2009)看来,所谓人文教育就是“人的教育”^[8]。吕晓芹(2015)指出,人文教育就是“人之为人的教育”^[9]。

应当承认,大学人文教育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被边缘化的现象日益突出,并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与负责任的公民”^[10]。杨叔子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称,“这是十分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富有远见的”,并提出以“文化素质”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是“现代大学之本”^[10]。有专家提出,要落实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就是要实现大学本科教育制度上的转型,从以往那种“只注重专业教育而缺乏通识教育”的本科培养模式转向“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发展”的本科教育模式,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一定比例的通识课程^[11]。在此视角下,大学英语课程的开设无疑是落实人文教育的举措之一。

诚然,如何在人文教育框架下落实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应该看到“人文性”对大学英语教育价值理性的规约。如果说,相对于“工具性”而言,语言的“人文性”并非存在共识,不妨大刀阔斧地从人文学科教育所具有的无可争辩的“人文性”这一视角予以理解,挖掘,探索中国外语教育中被疏离已久的价值理性取向。一个不容忽视、也不容被黑白颠倒的事实是,无论国家如何号召实施素质教育,包括大学英语教育在内的中国外语教育在实践上贯彻的多还是“工具论”,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都承认真正推进素质教育非常困难。在此意义上,素质教育还真成了有人跃跃欲试想要揭下的“遮羞布”。只是,如果连“羞”都不遮了,大家都在“工具论”的旗帜下跳舞,我们还是人吗?

应当刻不容缓地指出,以人文教育为内核的这种价值理性是应对全球化时代种种工具理性急速膨

胀、人的异化持续增强的希望所在。法兰克福学派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工具理性牢笼的批判在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发展的当下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在此前提下观照大学英语课程“人文性”的丰富内涵,既是对教育这种社会行为价值理性的坚守,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切实说来,坚持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就是要坚持在人文教育理念下确立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在人文教育理念下进行大学英语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在人文教育理念下组织教学和进行教学评价与反思。在教学理论层面,《要求》和《指南》都提出的个性化教学也是人文性教学的体现。王守仁(2015)指出,《指南》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课程设置、教学评价等中观层面,还是在课堂教学这一微观层面都体现了个性化教学^[12]。遗憾的是,《指南》目前对“人文性”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人文性”的主要表现就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指南》称,“就人文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学生学习和掌握英语这一交流工具,除了学习、交流先进的科学技术或专业之外,还要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3]其实,这里既提到了语言的“人文性”中最显著的一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提到语言教学的奥妙所在,指出语言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在培养听、说、读、写、译这些工具性目标的同时何尝不需学习文化?反过来说,跨文化教育何须必得通过“跨文化交际”类课程?要求中国学生学习职业英语或学业用途英语难道不需进行跨文化教育?

总而言之,在人文教育视野下审视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实质上是切实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素质教育目标的起点,一旦将“工具性”与之有机结合,素质教育之路就在脚下。如果说“素质教育”在此之前或多或少是“遮羞布”,甚至“皇帝的新衣”,不妨从现在开始、从自身开始、从每一堂课开始与“工具论”决裂,彻底消解长期以来大学英语四、六级水平考试对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实际操控,敢于面对各级领导对四、六级通过率的过分关心,敢于甩开各大出版社提供的教学课件,潜心钻研教材,积极主动地加入以研助教的团队,改变大学英语老师上课多、科研少的现状,全力以赴帮助广大学子走出虽然有心学好英语,但苦于信心不足的困境,把被动应付型的大学英语课堂变成具有生命力的课堂,给21世纪中国的接班人提供“优质外语教育”。

3 “工具性”的内涵及其误区

《指南》虽对“人文性的核心”有所描述,但对“工具性的核心”却缄口不言。对“工具性”内涵的认识只能从以下表述中略见端倪,“就工具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是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提升和拓展,主要目的是在高中英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大学英语的工具性也体现在专门用途英语上,学生可以通过学习与专业或未来工作有关的学术英语或职业英语,获得在学术或职业领域进行交流的相关能力。”^[2]

据此看来,如果一定要描述所谓大学英语课程“工具性的核心”,并套用“人文性的核心”所采用的句式,就可能是类似这样的表达,“工具性的核心是以语言应用能力为本,弘扬语言的实用价值,注重语言的综合应用能力和服务于专业发展、职业发展的需要。”显而易见,这样的描述将会是可笑的,因为人的主体性在此缺席了。无论多么强调语言可以并应当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都无法改变人是语言活动主体的根本事实。如果说国家的需要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的需要是经济意义上的,人的需要才是教育意义上的。张楚廷指出,“教育既不是经济本位的,也不是政治本位的,而应是人本位的。”^[8]

如此,《指南》之所以无意说明“工具性的核心”,是因为“工具性”实乃可谓实现广义上“人文性”的工具,无“本”可言,其满足的种种实际需要都必将指向“弘扬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这一真正的核心。只有认识到“工具性”存在的理性服务于“人文性”存在的价值理性,大学英语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逻辑关系才得以明了,大学英语教学才不会迷失指南针。

假设“西药治标,中药治本”这一命题成立,“工具性”就是大学英语课程的“标”,“人文性”才是大学英语课程的“本”。有效的大学英语教学作为“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应该是“标”“本”兼治的教学,是“工具性和人文性有机统一”的教学。余下的问题只该是,如何“标”“本”兼治。学校平台不

同、学生来源不同、学生入学水平不同、教师综合素质水平不同等等诸多因素都直接影响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问题的“标”“本”兼治。当前改革对“学术英语”的重视可谓治“标”意义上的新举措,在上海这种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一线城市试行,或可会有喜人成绩,但治“标”同时不能忘记治“本”。有学者提出,全球化的挑战要求大学英语改革的方向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工具论”,并以许国璋先生的文章作为强有力证据^[13]。说起来,许先生当年(1978)提出外语教学方针关系到国家利益,将新时期外语教学的任务概括为“以外语为工具,学习世界上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的时候,语气是谦恭,或不太肯定的,因为他接着补充了一句,“如果这一概括是正确的话”^[14]。与此同时,他旁征博引了各国人士在政治学、语言学、教育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建树并进行了论述,对国门被迫打开以来的外语教育历史如数家珍,并以鲁迅为榜样作结。换言之,许先生之“以外语为工具”远非旨在工具,而是在广阔的人文视域下谋求这一工具所能成就的一切,与当前落实于“学术英语”的“工具论”不可同日而语。声称要以许先生方针为当下方针的专家屡屡连许先生文章的标题都来不及看清楚^①,很难说全面细致地把握了许先生的深意。于学问,于社会,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若缺乏了价值理性的约束和导向,后果都不堪想象。

应该强调,《指南》在人文教育视野下提出大学英语课程的“工具性”绝不等于支持“外语工具论”。罗益民(2002)指出,“工具论”——“把外语仅仅看成一种工具并作为外语教学的指导思想的论调”——严重危害我国外语教育,直接造成了高校外语教育的“费时低效”^[15]。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外语工具论”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社会上的“外语工具论”——把外语仅仅看成一种有利可图的工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这种庸俗“外语工具论”极速膨胀,并与教育体制内盛行的“外语工具论”达成某种共谋,最终造就出一条畸形发展、让人欲哭无泪的外语教育产业链。以大学英语四、六级水平考试为例,20世纪80年代出台时可谓波澜不惊,影响仅限于高校内部。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它被嗅出无限商机,终于在某日造就出一个硕大无朋的产业链,即使在考试合格证书与毕业证书脱钩以后,依旧强劲地操控着产业链上每一个螺丝钉的生命,甚至挫伤了很多人学好英语的自信心,更不用提它还滋生了“代考”、电子作弊工具等非法业务。若非外语的“工具性”被相关部门的工具理性思维无限放大,一场原本旨在促进学生努力提高自身英语水平的标准化考试不至于成为从学生、教师到校长都无一能幸免的枷锁。时至今日,专门用途英语系列考试已粉墨登场,而国家英语能力等级考试也在紧锣密鼓的酝酿之中,且拭目以待,并祈祷两者未来发展之路不会重复毁誉参半的大学英语四、六级水平考试之路。

必须承认,工具理性左右下的高等教育是全球时代的普遍现象。2008年“第三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上,时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主席的索迪安(Crain Soudien)教授称,世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让绝大多数国家大力推进“工具性教育”的发展,只强调特定技能,而忽视其他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16]。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工具性教育”尤其显得迫切,因为全球化发展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方可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就中国而言,随着近年来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曾经压倒一切的工具理性似乎正逐步让位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理性。党和国家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规约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中的中国有意以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思潮,增强国家软实力。与此同时,拒绝“工具性教育”的人文教育思想传统重新得到重视,在此理念下的大学外语教育也明确回到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与“工具性”有机统一的格局,提倡将“工具性”统一于“人文性”的大学英语教学。认清大学英语教学的服务对象始终是人而不是物,广大从业者在应对新挑战的时候就不必担心英

① 蔡基刚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学工具与素质之争的意义》(2010)一文的第18条参考文献中将许先生文章的原标题《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误写为《论外语教学任务的方针》,还将原本是“6-15”的起止页码误标为“6-14”。他在《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调整——大学英语教学:向右还是向左?》(2014)一文中援引同一文献时,依旧沿袭了此前错误的标题,还将起止页码标注为“135-139”。

语成为各专业的侍从,不必害怕自己沦为侍从的侍从,就能以新的热情投入到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大学英语教育。

4 结语

世界全球化发展对于国家、社会、学校、个人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大学英语教师在此新形势下如何化压力为动力,借机提高自身综合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成为当务之急。《指南》在“教师发展”板块对高校和教师也都分别提出了要求,特别提出要确立“终身学习、做学习型老师的理念”,将不断学习和主动参与教学研究、教学改革作为教师自身发展的主要途径,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3]。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自身从事工作的性质,教师自身发展则无从谈起,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相反,充分意识到在大学人文教育视野下审视大学英语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认识到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受制于语言性质本身,认识到大学英语课程性质只能是两者的有机统一,方可切实思考、挖掘“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内涵及其对教学的指导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大学英语教育对国家、社会、学校、个人都至关重要,广大从业者不妨大力学习屈原夫子的精神,共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 [1] 丁研,蒋学清. 大学英语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辩[J]. 学术探索,2015(6):148-151.
- [2]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S/OL]. (2007-10-29)[2015-06-25]. <http://wyxy.gsau.edu.cn/info/1023/1614.htm>.
- [3]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大学英语课程指南(征求意见稿)[S/OL]. (2014-12-04)[2015-06-25]. <http://wyx.zzia.edu.cn/s/11/t/333/c7/c3/info51139.htm>.
- [4] 张绍杰.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语教学:行动与反思[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1):8-12.
- [5] 成镇权.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和谐统一:关于大学英语课程理念的思考[J]. 山东外语教学,2008(5):9-12.
- [6] Heidegger Martin. Letter on “Humanism”, Pathmarks[M]. Frank A. Capuzzi, Trans. William McNeill,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9.
- [7] 文秋芳. 大学英语教学中通用英语与专用英语之争:问题与对策[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1):1-8.
- [8] 张楚廷. 人的教育需要人的课程来支撑[J]. 课程·教材·教法,2009(3):3-6.
- [9] 吕晓芹. 大学人文教育的坚守与创新[N/OL]. (2015-05-10)[2015-12-28]. 光明日报, http://news.gmw.cn/2015-05/10/content_15617642.htm.
- [10] 杨叔子. 是“育人”非“制器”——再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J]. 高等教育研究,2001(2):1-10.
- [11] 甘阳. 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3):38-65.
- [12] 王守仁. 当代中国语境下个性化英语教学的理念与实践[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4):1-4.
- [13] 蔡基刚. 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学工具与素质之争的意义[J]. 外国语,2010(6):33-40.
- [14] 许国璋. 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2):6-15.
- [15] 罗益民. 外语教育“工具论”的危害及其对策[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3):50-51.
- [16] 索迪安. 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的特征及其发展前景[J]. 管冲,等译. 比较教育研究,2009(5):1-6.

(责任编辑 莫秀珍)